制度生命周期视阈下美国政治衰败与未终结历史

——兼论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观转型

汪波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北京 100875)

摘要:制度变迁是一系列制度安排基于竞争而形成的优胜劣汰的进化过程。随着时代的变迁,制度与生物体生命一样存在着“启动-兴起-高峰-衰败-更替”的新陈代谢周期。“历史的终结”提出者弗朗西斯·福山从大历史视角重新反思美国的政治衰败,认为全球化背景下成功政治取决于政府、法律和民主三者之间的均衡。制度生命周期视阈下美国政治衰败主要体现为四维维度:失衡的美国民主、基于理性选择的非理性政治、行政失灵与否决政治、基于两元合法性的美国宪政冲突。在制度生命力的竞争中,中国基于深厚而独特的东方文明,正建构一种不以西方文明为模板而富有竞争力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

关键词:美国政治制度;制度生命周期;政治衰败;未终结历史;超政党体制;弗朗西斯·福山

中图分类号:D77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3699(2015)05-0507-06

一、未终结的历史

冷战结束后,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所谓“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与之相应,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在世界扩散、实验、建构与运作。弗朗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中乐观地将西方自由民主制度视为“历史的终结”,认为西方宪政民主制度安排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因此构成了“历史的终结”^[1]。

历史终结论迎合了西方中心主义思维与情绪,弗朗西斯·福山因而成为西方主流政治学界的学术明星。但是人类历史的发展远比学者的有限理论归纳更为错综复杂,面对当代世界错综复杂的政治图景:世界民主样板的美国政党政治失灵、一些新兴民主国家的民粹化、中国模式下大国崛起、ISIS 极端组织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出现,等等。没有一种西方主流政治理论能对之进行有效阐释,也没有一种西方主流政治理论能提出一套系统有效的解决方案。自由民主制度的普适信心与乐观情绪在西方正悄然弱化。

弗朗西斯·福山对美国体制重新开始思考,

从大历史与全球化视角重新思考人类社会的政治秩序、政治衰败与历史发展:德国为何在 19 世纪变成高效的单一制国家,而且能在 20 世纪下半叶至 21 世纪达到繁荣?什么因素阻碍了阿根廷向美国路线发展?为什么当代美国政治处处掣肘,政府无法为社会提供有效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陷入政治失灵?传统一系列理论假设正在大历史与全球化视角下重新进行检验与修正^[2]。

弗朗西斯·福山提出“政治衰败”(Political Decay)这一概念。“政治衰败”并不是一个新的政治术语,亨廷顿早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就使用“政治衰败”的概念来解释发展中国家在民主化过程中所出现的政治不稳定,他认为政治稳定取决于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两者能否保持平衡,公式表现为:“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不稳定,即政治参与与政治不稳定性成正比,政治制度化与政治不稳定成反比。”^[3]随着信息网络时代的到来,公民政治参与诉求呈现边际递增,一个国家若不能相应提高政治制度化水平,国家则可能出现政治不稳定。

但是,“政治衰败”首次被弗朗西斯·福山用于剖析当代美国政治。弗朗西斯·福山一改“历

收稿日期:2015-07-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15BZZ083);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编号:14JZD029);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后期资助项目(编号:14JHQ012)。

作者简介:汪波,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系主任,教授,法学博士,哈佛大学访问学者,主要从事中国模式、网络治理和区域治理研究。

史终结论”的乐观情绪,不仅承认自由民主理论的运转失灵,而且认识到有效而强大的政府对于社会福利的重要性,“我真的认为民主陷入了困境,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在很多地方,民主的政府并不能为普罗大众提供基本的社会安全、教育、公共卫生。尤其在对抗腐败上,很多民主政府无能为力”^{[2]4}。英国书评者提姆·布沃利(Tim Bouverie)认为:弗朗西斯·福山以一位先知的激情和沮丧,重新书写美国政治秩序的衰败,努力在党派政治的嘈杂声中发出自己的声音^①。

弗朗西斯·福山重新确立了成功政治的公式,全球化背景下成功政治的条件在于政府、法律和民主三者之间平衡,这三组建制的平衡与发展是人类社会演化的普遍要求。法治和民主存在各种形式,特定国家的制度形式并不是普适模型,不同的社会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实施民主法治。

二、制度生命周期视阈下美国政治衰败:四重维度反思

制度与生物体的生命周期一样,存在着产生、发展、完善以及替代的流程。制度生命周期理论表明:“任何社会都不存在完美无缺的制度形式,每一种制度形式都处于产生、发展和完善并最终走向衰亡的历史过程。一种制度形式可能在初期是有效率的,但当制度的效率曲线达到一定点时,再发展下去就会导致效率衰减。”^[4]制度变迁就是由均衡到非均衡再到制度均衡的循环发展过程。

从人类政治秩序演化来看,欧美诸国自由民主制度适应了工业文明的内生制度需求,是一种与工业文明相适应的有效率的制度安排。但随着人类社会由工业文明向信息文明变迁,自由民主制度的制度收益呈现边际效用递减,越来越难以维持全球范围的制度比较优势与制度向心力。人类大历史反复证明:历史中一种曾经成功的制度安排并不能永恒地保持着制度生命力,任何政治制度都存在制度生命周期:启动-兴起-高峰-衰败-更替。“任何类型的政治体制——专制或民主——都无法免疫于这种政治衰败。虽然民主政治体制具有一定的自我纠正机制,但它也让强大的利益集团能够钻空子,以合法方式阻挡变革,最

终导致整个体制的衰朽”^{[2]23}。

现代自由民主政治体系包涵三种核心要素:政府、法治和民主,分别对应着行政、司法和立法体系。弗朗西斯·福山认为:“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离不开三根支柱:强有力的政府、法治和民主问责制。……美国当今的问题是法治过了头、民主过了头,而国家能力没跟上。”^{[2]57}当代美国政党政治衰败的根源在哪里?原因为何?这些问题的深度挖掘对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政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一)失衡的民主

西式自由民主体制的良好运行存在两大条件:法治与强大政府。如果法制尚未健全、有效行政系统尚未巩固,那么所谓民主政体往往被政治家所劫持与破坏。ISIS 极端组织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崛起说明:无论该地区是否存在民主制,恐怖势力都难以根除。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无论是叙利亚还是伊拉克政府皆未能建立强大而有效的政府,未对社会提供基本而有效的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从而引发民众对民主政体的失望,为极端组织的形成提供了社会土壤。

控权与效率的失衡。在美国政治演进过程中,开国先贤更关注权力约束,控权构成自由民主制度的基本制度基因,“但在制约权力之前,首先需要产生权力……政府不仅仅关乎制约,也需要提供安全保障、基础设施、医疗和法治”^{[2]121}。在美国国家机器中,美国民意评价较低的机构恰恰是被民主直接浸染的美国国会与白宫行政系统,而美国民意评价最高的机构是军队、航空航天局这些具有独立性但缺乏民主监督的系统。政府绩效、公民满意度与民主性强弱并不是必然统一体。

美国总统选举的民主悖论。美国总统选举是美国自由民主的核心环节,表1为美国总统选举得票典型案例统计,在美国总统选举历史上反复出现这样一种现象:普选得票相对较少的总统候选人却当选为总统,这或可称为民主悖论。什么原因导致“民主悖论”?主要原因在于胜者全得(winner-take-all)的计票规则^②。“迪维尔热定律”认为:选举制与政党制之间存在紧密因果关系。基于西方国家政党选举的统计数据,迪维尔热

表1 美国总统选举统计(1824~2000年)^②

情况	国民选举票	选举人团票	是否议会选举	合法性	出现次数	典型案例	
多数票总统	超过50%	超过50%	否	很高	27	1936年罗斯福当选	
少数票总统	渔翁得利型	低于50%	超过50%	否	较高	14	1860年林肯当选
	蛇吞大象型	低于50%,且低于对手	超过50%	否	低	3	2000年布什当选
	特殊型	低于50%,且低于对手	低于50%,且低于对手	是	很低	1	1824年约翰·昆西·亚当斯当选

发现:选举制度影响着这个国家的政党制度,多数选举制(特别是相对多数制)将更可能产生维持政府稳定的两党制,而比例代表制则更可能产生多党制和不稳定政府。

当代美国总统选举的民主悖论正从四种视角受到质疑:①第三党的屏蔽。依据“迪维尔热定律”,胜者全得计票规则形成了对政党体系的缩减效应(reductive effects),导致第三党难以对两党形成实质挑战,因为第三党基本不可能在主要州获得相对多数的选民票,因此难以获取选举人票。正因为如此,近百年来所谓的美国民主选举缩减为两党轮流执政甚至政治家族轮流执政。②民主:少数决定或是多数决定?尽管民主的内涵与定义存在着分歧与争论,但其共性得到公认,即多数人选择与多数决定。普选得票相对较少的总统候选人却当选了总统,这违背了西方民主的基本定义。③对美国选举人数较少的“小州”的忽视。由于“小州”的选举人数量相对较少,因此往往不能得到两党竞选人的重视。佛蒙特州州议员克里斯·皮尔森认为:在美国竞选中,“小州”只能在一旁观看,等候着加利福尼亚州、佛罗里达州等几个主要“大州”的投票结果,因为“大州”被赋予了大量选举人票。2004年总统竞选中,竞选双方花费的资金的三分之二都用于对竞选举足轻重的5个“大州”。④“稳拿州”的忽视。当代美国两党政治影响力呈现出刚性的地理分布:南方地区为共和党势力范围,而东北部地区与西海岸地区则成为民主党的势力范围。在“胜者全得”的计票规则下,两党将精力聚焦于“摇摆州”与“大州”^④,较少关注双方的稳拿州。马里兰州就是一个“保险州”,民主党可稳拿此州选票,因此两党候选人都愿来马里兰州开展竞选活动。

(二) 基于理性选择的非理性政治

在多元主义视角下,政治源于理性的政治人基于偏好最大化的策略选择,“在‘经济’和‘政治’之间或在‘市场’和‘政府’,‘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之间,并未划出任何界线。……通过交易经济学方法的或多或少的自然延伸,经济学可以根据交易范例来观察政治和政治过程”^[5]。理性选择的思维同样可用于西方民主政治的分析,但是个体理性选择既可能导致理性政治,也可能导致非理性政治。

第一层面:个体有限选举理性的叠加可能导致团体非理性格局。民主是选民理性选择与公共讨论的过程,社会福利对选民与政治家的引诱可能使公共政策偏离社会可持续发展。布莱恩·卡

普兰认为:“由于‘理性选民’的偏见,选票会被各种利益集团所利用。理性选民倾向于高福利,政党在竞选中争打高福利牌,结果使政府陷入了高福利引发的债务危机(如希腊)。美国政党政治发展不在于增加民主的量,而要提高民主的质。”^[6]由此可见,高参与度的选举政治并不能必然导致优良公共政策,正如政治学学者布鲁斯·凯恩指出:大多数公民没有时间、没有能力、没有意愿去处理复杂公共政策议题^[7]。弗朗西斯·福山也关注到选举政治中选民有限理性导致非理性结果,认为:普通选民如果不知道精英偷走了他们的钱,他们也就不会感到愤怒。在美国总统选举中,许多工人选民将选票投给承诺为富人减税的总统候选人,因为他们认为减税政策能够刺激经济增长。

第二层面:修正多元主义视野下西方政党政治。达尔多元主义视野下的美国政治是多元利益集团之间平等而无休止的讨价还价过程。美国的利益集团和游说公司数量呈现出爆炸性增长,1971年美国存在175家游说公司,而在1981年达到2500家,在2009年增至13700家^[7]。各种利益集团的影响力、权力和资源配置并非均等,各种利益集团对政策议程的影响力千差万别。在美国政治过程中,政治精英、经济精英与知识精英在获取资源、信息和话语权方面占有主导优势。资本社会中寡头集团通过各种游说机制,控制与影响着公共话语权与公共决策议程。寡头集团以自身利益为核心,往往阻止符合社会整体利益的变革。

第三层面:市场经济、利益集团与民主制度。市场经济通过自由竞争自然产生经济意义的赢家和输家,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放大了公民获得财富的能力不平等、扩大了贫富鸿沟。当美国社会的经济赢家(华尔街)进一步企图寻求把其财富优势转变成不平等政治利益分配时,就会导致民主外表下寡头资本政治,反过来进一步深化贫富鸿沟,加剧资本阶层与底层社会的冲突(占领华尔街),最终导致民主社会进一步碎片化。“原子化”的普通民众感受到民主外壳下政府被各种类型精英所操纵,选举并不能真实反映大众利益诉求,从而出现代表性危机(crisis of representation)。曼库尔·奥尔森探讨了利益集团、民主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认为“在和平、稳定的环境下,民主制度会不断积累利益集团,这些集团不是在创造财富,而是利用政治体制攫取利益或寻租,这种租金损害公众利益。但公众无法进行有效组织,不能像银行业或玉米生产商那样自觉保护本行业

利益,结果寻租行为就这么耗下去,只有战争或革命等社会大震荡才能将其强行阻断”^[8]。

(三)行政失灵与否决政治

弗朗西斯·福山在新著中提出了一个新概念:“有效政府”或“体面政府”(decent states)。有效政府意指政治系统中存在着强大而有效的国家官僚体制,能够有效施政、维持法治并进行定期的权力轮替。“政治衰败会发生于任何政权。(美国)制度本来是解决特定问题的工具,但后来它们变成了目的,被赋予了内在价值”^{[2]213}。“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9]。在西方多党竞选制度下,政党反复轮换导致国家建设规划难以延续,美国政府能力与规模正在趋于弱化。

美国通过设置复杂的权力制衡机制以防止权力滥用,“权力在参议院、众议院、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间进行分配,但事实上就如同亨廷顿所言,这不是在分配权力,而是在复制权力”^{[2]135}。权力的过分限制导致政党对峙与否决权的随意使用,使政府难以作出有效决策。美国国会超级委员会未能就预算达成协议(2010年)反映出美国政治制度缺陷:民主政治正成为“否决政治”。美国宪法通过一系列制衡机制限制了行政权力,当这种体制遇上被意识形态化的两党对峙,就会导致政治瘫痪。

行政司法化与民主过度约束使行政系统缺乏创造力与执行力。司法对于行政机构的不信任,激励着司法对行政系统进行频繁的司法审查,从而损害有效政府的施政效率。弗朗西斯·福山以美国森林局为案例,说明美国司法机构如何削弱行政机构。美国森林局(成立于1905年)曾是美国高质量官僚机构的典范,其在成立之初为独立组织,国会不能随意干涉其决策。但是,当前美国森林局已失去了大部分自主性,受到国会和法院名目繁多而且相互矛盾的各种命令。有效政府应基于法律进行运作,但是法律应清晰客观,并赋予行政主体一定自由裁量权,“最好的官僚机构能够自主运用判断力作出决定、去冒险和创新,最糟糕的官僚机构执行他人制定的详尽的规则。普通公民会被不会使用常识、盲目地遵守规则的官僚逼疯”^{[2]201}。

国会将更严格繁芜的法令施加于行政部门,使行政体系墨守成规,缺乏创造力、执行力和连贯性。国会授权成立了各种新联邦机构(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环境保护局等),但国会不愿把相应的权力交给这些机构。在日本或瑞典,官僚体系

内部可通过协商方式解决冲突。在美国,争议往往需通过诉讼解决,这使行政系统充满不确定性、程序复杂性,增加了制度运行的交易成本。如何摆脱美国“政治瘫痪”(entrenched political paralysis)? 弗朗西斯·福山在考察德国如何在19世纪变成高效国家时,认同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理论,认为强大而负责的有效官僚制是有效政府的关键。官僚制以理性和效率为支柱,以专业化官僚为主体,通过职能分工和职位分层,形成规则化的组织体系。官僚制与自由竞争市场经济、理性法律体系一起推动了工业时代的社会发展。这种工业时代的官僚制重新进入了弗朗西斯·福山视野,成为解决美国政治失灵、增强政府能力的一种药方。

无论一个国家处于何种时代、无论实行何种形式的民主制度安排,政府能否有效输出社会所需要的公共服务是秩序的基石。权力约束不是政治体系的全部,而是有效政治运作的前提与保障,现代政治的终极价值在于为社会提供有效公共服务。弗朗西斯·福山甚至悲观地指出:宁要民主专政,不要否决政治。发展中国家要摆脱贫困,实现快速而具包容性的发展,需要有效政府组织资源,消除经济发展、突破各种利益瓶颈。公共权力源于公民权利的赋予,服务并统一于公民权利。行政权一旦形成,便同公民权利一起结成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对立的关系。罗豪才教授从行政法视角提出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平衡论,“行政法的平衡状态是行政机关与相对方之间形成的兼容非对等性的权利抗衡状态,是行政法的最优化状态”^[10]。现代政治制度设置应平衡公共管理权与公民权利,达到控权与效率间的均衡。

(四)基于两元合法性的美国宪政冲突

西方传统法治理论以古典自由主义为基础,旨在最大程度降低政府侵害公民的机会,以避免暴政。正如麦基尔韦恩所言,宪政意味着“对政府施加合法的制约……(它的)反面是专制统治”^{[11]2}。美国总统制下政府与议会的两元合法性既构成了相互制衡,也导致“一山两虎”的不稳定政党政治。总统制下立法机构与行政机构各自存在独立选举基础,从而形成了民主合法性的二元化来源。当总统和国会多数发生分歧时,政治梗阻就会出现。以美国财政预算为例,总统在一个财政周期开始时宣布一份预算草案,但这份草案仅是政府“想要”的预算。根据美国宪法,国会拥有决定政府开支的绝对权力,535名国会议员都可用否决权来换取某种妥协。在经过各种利益

集团的反复游说之后,最终的预算法案不再是条理清晰的体系,而是议员们相互角力、相互交易和相互妥协的利益博弈结果。

在英国威斯敏斯特体制下,财政预算的民主过程并不存在过多的“否决票”行使机会。英国财政大臣在对支出和税收进行权衡后,提出一份预算草案,议会通常在两周后通过预算。威斯敏斯特政体的优点源于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之间的相互依赖。在议会制下,议会多数党决定了行政部门负责人,行政首脑需得到立法机构的多数信任才能得以生存,因此行政首脑必须保持与议会良好沟通。即使行政首脑在议会制下未能得到议会多数支持,行政首脑可通过宪法手段解散议会、重新大选来解决两者争端。英国采用简单多数票当选的议会制,既不存在联邦制度,也没有成文宪法,在此体制下,政府一般会获得议会绝对多数票支持。英国议会不允许美国式冗长辩论,法案一旦由议会通过,通常不会遭到阻挠,正因如此,英国体制常被称为“民主独裁制”。

与英国威斯敏斯特政体的“民主独裁制”相比,美国政治梗阻表现得尤为显著。由于行政与立法系统各自存在独立合法性来源,总统与国会之间的矛盾无法通过民主程序解决。在议会政治中,议员们发现:用增加支出来换取减税,更容易达成共识,因此美国财政更容易出现赤字。“要摆脱目前政治僵局,我们不仅需要强大领导层,还需修改美国政治机构的相关法律法规。修改美国宪法目前看上去不太可能,但美国可实施一系列改革,减少动用否决票的机会和简化决策程序。可实施的改革包括:一是废除参议员的阻止表决权,二是减少对常规立法的阻挠;三是禁止通过不相干的修订案进行立法要挟”^[12]。

公民权利的实现离不开公共权力的运作,公民权利与行政权力之间的互相作用共同维持着政治统一体的有效存在,“在社会权利结构中,若国家权力比重过小,公民权利比重过大,就会导致政府失能的种种不良后果,如社会经济秩序混乱等;而如果公民权利比重太小,国家权力比重太大,则又会形成本末倒置,公民权利无法有效约束国家权力,反而被国家权力所扼制的局面”^[13]。控权与有效政府的有机统一是现代宪政发展趋势,控权却不囿于控权,现代宪政精神总体发展趋向于实现控权与效率的有机统一。美国当代著名宪政学者斯蒂芬·L·埃尔金等主张:“宪政理论与宪政实践需要从批判怀疑主义转向思考良好社会如何得以维系。新宪政论不否认宪政制度的控权价

值,但也需要表明民主政府既能受到制约又可能动进取。”^{[11]39}

三、结语:制度生命周期视阈下制度生命力竞争

制度变迁是一系列制度安排基于竞争而形成的优胜劣汰的进化过程。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由于率先迎合了市场经济与工业文明的内生制度需求,从而使欧美成为人类社会最具竞争力的发展区域。但任何制度的优越性只能是一定时空条件下的比较优势,而不可能是绝对优势。制度与生物体的生命周期一样,存在着产生、发展、完善以及替代的流程。

竞争是制度变迁的源动力,人类社会的政治制度是在相互竞争中不断发展、不断完善、永不停息,“不同的制度产生于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国家,就会有不同的时代性和民族性,它们会各有长处和短处,也会共存与竞争。那些有生命力的制度具有学习力、创造力,因而就具有竞争力,即使处于弱小不利的地位,它们也会沿着国家生命周期的历史轨迹进入成长期、加速期,达到强盛期。在国际竞争背景下,凡是不能与时俱进的国家,即使是最强大的国家,都不可避免地逐步老化,走向退化,进而衰落”^[14]。

任何政治制度模式既存在比较优势,也存在比较劣势。相对于美国政党体制的“否决政治”,“中国执政党具有超政党体制特征,超越了各利益集团单一利益诉求,代表着国家根本利益,能将各阶级、各阶层多元化利益诉求统合凝聚于增长共识,最终实现国家统一有效的战略治理”^[15]。

历史从未终结,任何制度要保持其比较优势与生命力,就必须在竞争中新陈代谢。随着人类由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向全球化信息文明演进,中西方制度皆在不断变迁、新陈代谢,以适应与满足时代发展的制度需求。在制度生命力的竞争中,中国基于深厚而独特的东方文明,正建构一种不以西方文明为模板而富有竞争力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

注释:

①参见谢秉强:《开倒车还是与时俱进:英美媒体热议福山新作》(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70561)。

②参见赵心树:《选举的困境——民选制度及宪政改革批判》,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2页。

③“胜者全得”的计票规则意指一州的选举人票全部

给予在该州获得相对多数选民票的总统候选人。这一计票规则意味着:一个州中获得选票最多的候选人,将赢得该州全部选举人票。胜者全得的规则可能使在大选中获少数选民票的候选人当选总统。

④2000年小布什(George W Bush)与戈尔(Al Gore)争夺总统,小布什险胜,他在摇摆州(佛罗里达州)只赢了大约300票,可由于种种原因被选举读卡机拒绝的废票竟有17万张之多。两人为佛州重数选票和如何处理这些废票打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院,小布什最终获胜。

参 考 文 献

- [1] 弗朗西斯·福山. 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M]. 黄胜强, 许铭原,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124.
- [2] Fukuyama F. 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 fro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of democracy[M].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4.
- [3] 塞缪尔·亨廷顿. 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 李盛平, 杨玉生, 李培华, 等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8: 56.
- [4] 李怀. 制度生命周期与制度效率递减——一个从制度经济学文献中读出来的故事[J]. 管理世界, 1999(3): 68-78.
- [5] 詹姆斯·M·布坎南. 自由、市场与国家——8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M]. 平新乔, 莫扶民, 译. 上海: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分店, 1989: 31.
- [6] 布赖恩·卡普兰. 理性选民的神话: 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M]. 刘艳红,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78.
- [7] 弗朗西斯·福山. 政治衰败的美国只有“死路一条”[EB/OL]. [2015-05-02]. <http://money.163.com/14/1013/10/A8E9DT8200253B0H.html>.
- [8] 曼库尔·奥尔森. 国家兴衰探源: 经济增长、滞胀与社会僵化[M]. 吕应中, 陈槐庆, 吴栋, 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98.
- [9]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EB/OL]. [2015-05-02]. <http://news.sohu.com/20140921/n404508728.shtml>.
- [10] 罗豪才, 甘雯. 行政法的“平衡”及“平衡论”范畴[J]. 中国法学, 1996(4): 48-56.
- [11] 斯蒂芬·L·埃尔金, 卡罗尔·爱德华·索乌坦. 新宪政论——为美好的社会设计政治制度[M]. 周叶谦,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
- [12] 弗朗西斯·福山. “否决政治”让美国瘫痪[EB/OL]. [2015-03-16].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1877>.
- [13] 童之伟. 公民权利国家权力对立统一关系论纲[J]. 中国法学, 1995(6): 14-23.
- [14] 胡鞍钢. 美国为何衰落[J]. 学术界, 2014(5): 5-13.
- [15] 汪波. 西方政党政治与超政党体制: 比较与竞争——兼论中国政党制度生命力[J]. 社会主义研究, 2014(6): 91-97.

[责任编辑 周 莉]